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一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七九期 ——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1c）

-
- | | | |
|--------|----------------------|---------|
| 【文献资料】 | 1966年南京“八三”事件的若干档案资料 | |
| 【亡灵祭坛】 | “北大才子”沈元被处决及其他 | 王 锐 |
| 【人物追踪】 | 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 | 刘庆棠·陈徒手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献资料】

1966年南京“八三”事件的若干档案资料

◇ 资料一

南京师范学院档案室档案：省公安厅关于“八三”事件的专报，1966年8月9日

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文化大革命保卫工作情况专报（三十一）

省委、中央公安部：

八月三日晚，南京师范学院少数学生把吴天石（原省教育厅厅长，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已在新华日报揭发批判）、李敬仪（女，南师党委副书记，吴的爱人，该校师生揭发了她一些问题）张焕庭（南师副院长，该校师生揭发了他一些问题）三人，从宿舍拉到学校斗争，戴高帽子游街，并且被打，李当即死去，吴昏厥后，经抢救无效于五日晚死亡。初步了解，发生这个事件的过程如下：

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决定撤出学校文化革命工作队等消息，八月一日□□（字迹不清——编者）北京大学学生来信传到南京师范学院。三日，工作队向全体师生员工传达了撤出工作队的问题。当天上午，有些学生就分头到南京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去串连、摸情况，酝酿给斗争

对象戴高帽子。下午六时许，中文系有三个学生写大字报，提出要在四日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戴高帽子斗争。紧接着，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宋学文为首，在大饭厅开会，计议四日给李敬仪、张焕庭、孙志成（南师宣传部长）、肖亚（南师总务处长）、朱彤（中文系教授）等人戴高帽子游行。随后，外语系二年级学生黄加友写了一封紧急呼吁书，要革命同学当晚行动起来，给李敬仪等人戴高帽子游行，交给广播室反复广播。外语系学生丁敖大，积极主张当晚行动，他说：“晚上不行动，我怕第二天有新政策干不成。”

八时许，黄加友、宋学文和外语系学生葛锦安、中文系学生曾耕媛（女）四人，带领二、三十个学生，到校外李敬仪、吴天石的住宅，把李、吴拖出来，又到校内张焕庭的住宅把张拖出来，三人都戴上高帽子，带到校内的草坪上斗争，站在大桌子上，时而罚跪，时而站起，周身都泼了黑墨水，有的学生乘机拳打脚踢。当时围着看的有一千多人。

九时多，中文系助教汤大民提议要把这三个人弄上街游行。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王建新高喊“现在游街开始”，一部分学生当即响应，几百人拥向校外。此时李敬仪、吴天石已经难于走动，有的学生说他们是装腔作势，几个学生架着他们走，连架带拖，卡着李的脖子，不断地打，拖了近三华里，李已昏厥。有人说她是“装死”，有的学生抓着李的脚在地上拖。教育系学生余焕祥用冷水淋，见李仍然不动，又打了四拳。当时有人提议先把李抬回家，以后再斗争，说她反正跑不了。十时多，一些学生连抬带拖，把李抬回家后，医生来抢救时已经死去。当时，还有的学生认为李是装死，有两个人跑回校内拿来一副担架，准备把李抬回学校继续斗争。

另一批学生拉着吴天石、张焕庭游街后，又带回学校再次斗争。几个学生问张焕庭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黑帮？张连声回答“是”，“是”，学生要他交待问题，张接连讲了几条，学生放开张后，斗争吴天石。吴被用一条棕绳捆绑，有的学生打他，卡他的脖子，问他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吴由于经数小时被拖、推、打，有气无力，答不出话，当场昏倒，几次被用冷水淋。省委宣传部赶去进行工作的姚焕其同志站在桌上劝说时，被汤大民拖下来。直至深夜十一时以后，经过工作队和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再三劝说，斗争才停止。几个学生把张焕庭送回宿舍，吴天石当即送医院，经抢救无效于五日晚死亡。

当学生带着吴天石等三人游街时，省高教党委工作人员杨全美路过时看到，说这样做法不对头，要斗争最好在校内搞，有些学生当即把杨拖到校内斗争，并打了他。

这一事件发生后，该校师生称之为“八·三事件”，议论纷纷，从四日晚开始分班级、小组展开讨论。三派意见的斗争很激烈。

一种意见是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这种意见占大多数，全校一百多名工人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根本没有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工人张连兴、马维忠说：“党叫我们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没有叫我们把他们打死。问题还没有充分揭发出来，就把人搞死了，这怎么行。有的人嘴上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是不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坚决反对。”这些工人主动要求成立“保护队”，表示“要积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秩序，不容许打人、搞死人，谁要戴高帽子游街，就和他辩论说道理。”化学系学生李正、马淑惠、张启等三十九人联名写大字报指出：“八·三事件绑人、打人、搞死人，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所不能容许的。这个事件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应当负责任。”教务处职员陈光然、董忠寿说：“把吴天石、李敬仪、张焕庭戴高帽子游街，捆绑打骂，是严重违反政策，违背了毛主席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指示。”六百号教室的教职员董建民、徐明华、张钰英等四十四人联名写大字报，指出：“八·三事件是少数人利用革命师生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搞起来的。参加这次事件的只是少部分人。我们对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是支持的，但对少数人的做法是不能同意的。大多数人要八月四日白天搞，而有人说今晚不搞，

明天听过报告后就搞不起来了。这句话不正是道破了八·三事件的实质吗？说明了这些人多么害怕党的政策，多么害怕党中央的指示。”中文系二年级二班学生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把吴天石拖出来斗争，戴高帽子游街，是违法的，吴是省教育厅长，他的反动教育思想影响很大，应当由全省来揭发批判，南师学生没有权力把他弄来戴高帽子游街和动手打他。”这些学生表示，谁不同意这个意见，愿意写大字报，开大会进行讨论。

另一种意见认为“八·三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中文系学生夏云儒、李有根（积极参加戴高帽游街活动的）等四人联名写了一张题为“通告”的大字报，说“八·三事件是革命行为，取得了很大胜利。李敬仪一命呜呼，其他牛鬼蛇神也要低头认罪，否则李就是榜样。”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周立义写大字报，说“八·三事件，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李敬仪、吴天石、张焕庭犯了滔天罪行，他们被打是应该的。李敬仪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革命师生的行动吓破了胆，死是应有的下场。”政教系学生黄云平（积极参加戴高帽子游街活动的）说：“那[哪]个不承认八·三事件是革命行动，我要和他拼到底！”

第三种意见认为“八·三事件”是革命行动，但是也有缺点，地理系三年级一班二十三个学生，有十六个学生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但也有缺点和教训：（1）方向对头，就是方法简单粗暴；（2）动机是好的，但收到了坏的效果。要看主流，如果不死人，锦上添花，效果更好。

还有不少师生对工作队提出意见，主要是两条：第一，发生这个事件之前，已经有了苗头，并且有人向工作队反映情况，工作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对待。第二，发生这个事件，在校内草坪上斗争，戴高帽子，打人，特别是外出游街时，工作队没有及时进行工作，加以制止。

周围居民目睹这一事件的也有反映。工人王正家说：“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狠狠斗，不过这样搞法太乱了。”南阴阳营妇代主任祁美云说：“这样搞不符合党的政策，对斗争不利。”居民王万清说：“对待坏人应该说理斗争，搞乱了容易被坏人利用。”

李敬仪被打死，吴天石被打后不治身死，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没有表示态度，他们在看党和政府对这个事件到底如何处置。有的议论在通常情况下，打死了人，是应该对肇事者和凶手追究刑事责任的。南师的这一事件，是否要处理，怎么处理？

据我们初步调查，这个事件发起的主要人物是：宋学文（共产党员，家庭是上中农），黄加友（家庭是上中农），丁敖大（家庭是贫农），汤大民（共产党员，父亲是国民党军医，一九五七反右派斗争时，因有反动言论，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王建新（共产党员，家庭是中农），葛锦安（家庭是商人，今年七月初曾哄闹新华日报社）等人。另外，在这个事件中，还发现动手打人比较突出的有学生阿开举、史济贤、刘君松、余焕祥、柯家莉等人。由于正在开展运动，目前又处于决定撤出工作队的转变过程中，这个事件又比较复杂，我们的调查还不深不细，有些情况还没有见底。

江苏省公安厅（章）
1966年8月9日

报：省委、中央公安部、华东局办公厅、省委政法小组。
抄：专、市公安处局长（共印62份）

江苏省公安厅 1966年8月9日印发

◇ 资料二

南京师范学院档案室档案：关于“八三事件”专案调查组的简报，1978年9月14日，编号：10，机密

关于“八三事件”专案调查情况简报之一

遵照省委指示，我们在省委材料组、省公安局派员直接参加和具体指导下，由院党委负责同志主持，于七月十九日从组织、保卫等部门抽调了五名干部，组成“八三事件”专案组。到九月八日止，已向校内外七十名知情者和二十名参与者作了调查，对“八三事件”的始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掌握了肇事凶手的重要线索和有关“八三事件”的重要旁证，为深入调查作了必要的准备。现将工作进展情况和下一步打算请求汇报如下。

一、掌握了有关“八三事件”的重要旁证共计四件：

- 1、工人医院抢救吴天石同志的病历以及该院医务人员提供的综合材料（附复印件一份）
- 2、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南京市公安局五处法医对李敬仪同志遗体的检验鉴定书（附复印件一份）
- 3、新华社记者吕厚民同志拍摄的现场照片两张（附复印件两张）
- 4、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省公安厅编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保卫工作情况专报（三十一号），此专报是反映“八三事件”的（见附件）

二、对“八三事件”的始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八月初，撤出驻高校工作队的决定传达后，南大、华水等校先后发生在校内搞游斗的事件。而新华日报上点了吴天石同志的名，南师党委扩大会上对李敬仪同志的揭发批判，也为南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乘机利用。

八月三日下午，外语系学生黄嘉友等人串联商定，要在当天晚上游斗李敬仪同志，黄还写了紧急呼吁书，交广播站反复广播。

晚饭后，英语二年级二、三班除少数反对者外，绝大部分人参加了糊制高帽子、做旗子、找绳子等准备工作。

九时许，以英二（3）班为主，外语系其他班和中文等系也有学生参加，在黄嘉友等人带领下，有数十人拥到吴、李家拖人。吴、李两同志被拖进学校后门时，队伍中开始呼口号，参加进来的人逐渐增多，秩序很乱。另一部分学生又拖了张焕庭同志尾随而来。拖人的队伍到大草坪时，正值电影快放完，有个学生在放映机话筒前高喊：“看完电影不要走，接着开批判会。”顿时，就有几千人拥向拖人的队伍。吴、李、张三位同志很快被押持到100号楼大门前临时搭的台子上，一些人用字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套在他们头上，浑身浇上墨汁，在混乱中有人乘机拳打脚踢。

关于谁提出游街的问题，据初步调查，有两种说法：一是中文系助教汤大民跳上台，作了煽动性发言，最后建议拉出去游街，还举起手臂一挥，大喊一声：“走啊！”。一是中文系学生王建新（院学生会主席）喊了一声：“现在游街开始”，于是按吴、李、张的次序形成三个游斗的人群拥向校外。

李敬仪同志被一些人连架带拖，衬衫又卡着脖子，还不断地殴打，沿着北京西路、西康路拖了近三华里，李的脚后跟皮肉全磨掉。到仙霞路口，李已昏厥，有人还抓住李的脚在地上拖，致使李的右臀部大块表皮磨掉，还有人一边用脚踢一边骂：“装死！装死！”。后来，有些学生把李抬回家。夜间二时许才用救护车送到工人医院抢救，医生一看，李敬仪同志早已死去，此时李头上还戴着高帽子，胸前还挂着“黑帮×××”的牌子。据初步调查，架拖李敬仪同志的学生主要有：化学系吴家凤、中文系曾根媛，外语系冯启兰，教育系俞焕祥等人。

吴天石同志经过一路的折磨，拖回学校，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仍被架上台、施以“喷气式”，进行批斗。上台发言的人厉声责问吴是不是三反分子？是不是黑帮？吴回答时声音微弱，但很坚决：“我不是，我是中国人。”这时台上有人大声向台下传吴的答话，少数人就哄叫起来，押持的人就向吴施以揪头发、扳手、罚跪等体罚。

这时，汤大民又跳上台作为第一个教师支持这次“革命行动”，起的作用很坏，特别是当时省委宣传部联络员姚焕熙上台劝阻制止事态发展时，汤仍继续质问吴天石同志，使批斗直到十一时以后才停止。十二时，把吴送工人医院抢救。医生见吴全身肌肉抽搐抖动，口中喃喃作语，瞳孔放大，神志不清。按照省委领导指示，经工人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吴天石同志于八月五日十九时逝世。

据初步调查，在台上对吴天石同志揪斗行凶的学生主要有：数学系徐延昌、王振清，中文系张炎荪、皇甫贵宝，外语系阿开举、曹亚民、柯家礼，政教系何惠斌等人。

三、下一步打算

经过前一阶段工作，我们认识到查清“八三事件”有不少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具体困难。

有利条件是：省委重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展开，时机有利；“八三事件”主要是在公开场合干的，调查线索多，重要证据已掌握。

具体困难是：参与“八三事件”的涉及到六六届到六九届数千名学生，虽大部分在本省，但也有少数重点对象分布在全国各地。线索分散，调查工作面广量大；“八三事件”时间短促，场面复杂，时隔十二年之久，调查材料大多凭记忆，模糊不清，确证不易。到目前为止，“八三事件”的策划过程还未完全查清。

为此，我们下一步打算是：

- 1、对知情人或有牵连的人，继续做好思想工作，按照43号文件精神，反复讲明政策，使大多数一般参与者放下包袱，大胆揭发重点对象的问题。
- 2、对初步排出的直接参与“八三事件”情节较严重的三十六人逐个分析，进行调查。
- 3、为了更好地依靠所在单位党组织，取得他们的支持帮助，对调查对象共同谈话，一起做好工作，密切注意动向，加强安全措施，希望省委给予具体指示。
- 4、力争在短期内把全过程弄清楚，把主要情节搞准，突出少数几个重点人物，然后分别情况，拟订具体方案，报请省委批准，或集中起来，或分别责成所在单位办学习班，进行专案审查。

以上汇报，如有不当，请予指示。

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委员会（章）

1978年9月14日

报送：江苏省委、江苏省教育卫生办公室、省政法小组、省委材料组、省公安局

◇ 资料三

南京师范学院档案室档案：省公安厅关于“八三”事件的调查报告，1980年4月13日

关于南师八三事件的调查报告

省委政法小组：

关于吴天石、李敬仪夫妇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被残酷迫害致死一案，经过一年多来调查，现已基本查清，特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二十篇文章，点名批判原教育厅长吴天石同志。同年七月九日到二十八日南师党委召开扩大会，批判付书记李敬仪同志。（吴天石同志爱人）八月三日驻南师工作队传达了撤出决定。同日南大、华水在校园内游斗了学校的领导同志。这些行动对南师学生影响较大。当天下午，外语系英二（3）班学生黄家友在与本班同学议论时，首先提出要在当晚批斗李敬仪同志，他的提议得到大部分同学的赞同与支持。当即，谢长珍等人就糊了高帽和小旗子，准备批斗时用。黄家友拟了口号，并写了一份《紧急呼吁书》，送学校广播站广播，要大家晚上参加批斗李敬仪的大会。这时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吕左兵、徐荣生、咸国庆、孙以美等人得知外语系当晚要批斗李敬仪的消息后，认为这是“革命行动”表示要积极参加。

在这种形势下，王建新（学生会主席）等人以学生会名义于晚上七时在中大楼115室召开全系科学生干部会议，研究如何批斗李敬仪的问题。会上，以王建新为代表的大部分学生主张先作好准备，于八月四日批斗。而外语系以黄家友为代表的部分学生则坚决主张当晚批斗，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黄家友、殷重华等就中途退出会场，回教室。由于黄家友等人坚持要在当晚批斗，并有外语系大部分学生的支持，当晚八时许，黄带头和邹伟良、董鹤松、殷重华、金韵芬、吴珏珏、吴淑凤等人到李家抓人。中文系曾根媛、宋学文、张炎荪、徐景洪、夏传兴等人听说外语系已去抓人，也跟随而去。共计二、三十人。到李敬仪家后，看到吴天石同志也在，便将吴、李两人一起抓走。到学校后，黄家友、邹伟良、金韵芬等人又将南师付院长张焕庭抓来。当三人被揪到南师大草坪时，草坪上电影将要结束，观众还未散。“打倒吴天石”、“打倒李敬仪”的口号声传遍全校。这时正在中大楼115室开会的学生闻声后立即离开会场，参加批斗大会。吕左兵跑到电影机前呼喊：“李敬仪抓来了，大家参加批判会。”顿时，千余名学生涌向一百号楼台阶下。吴、李、张三人被罚站在一百号楼台阶上，这时，有些人向吴、李、张泼墨汁，有的给他们戴上高帽，也有一些人乘机拳打脚踢，黄家友参与架人、按头等体罚活动，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失去控制。这时，中文系的吕左兵、徐荣生、孙以美、咸国庆和其他人一起议论，认为先游街，等搭好台子回来再开批斗会。当他们正在议论时，周围有人喊“游街”随即，吴、李、张三人被拖出南师大门上街游斗。这时咸国庆随人流游到半途又返回南师，组织八、九个学生搭起批斗台子。

游街中吴、李、张被分成三个圈子，分别由二、三人架着，后面跟着一大（批）群众。黄家友架着吴天石同志，徐荣生、汤大民也在吴天石的圈子中领呼口号，积极参与游斗活动。在游街过程中，吴、李两人不断遭到人身摧残。由于当时气温高，跑得快，身上毛孔被墨汁堵塞，李敬仪同志走不多久，无力支持，被几个学生拖着，上衣领勒到颈部，拖到西康路时，窒息死

亡。

吴天石、张焕庭两同志游街回校后，被揪在临时搭的台上批斗。徐荣生首先上台，作了“批判”发言。吕左兵、咸国庆、孙以美及其他学生也分别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说吴天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反对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要他低头认罪等等。由于会议缺乏准备，毫无秩序，始终一片混乱。这时汤大民跳上台去，对吴天石进行“批判”，硬逼吴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批斗中汤在传吴天石话时，大声疾呼地说：“吴天石说他要报仇。”接着无限上纲地加以“批判”，引起台下人的起哄，台上的打手对吴天石同志武斗加剧。这时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对现场拍照，徐荣生叫另一学生去把胶卷扣下。吕左兵高呼口号，不准记者拍照，还跟着人群围攻记者。后来，事态继续恶化，省委工作组姚焕熙同志在台下找到吕左兵、徐荣生、汤大民等人进行劝阻，提议休会，汤大民带头不听劝阻，要姚焕熙同志对当晚的行动表态，要承认是“革命行动”才同意休会，吕左兵等人积极支持汤大民的错误主张，要姚明确表态才结束会议，劝阻没有生效。此后姚焕熙同志又一次上台对大家进行劝阻，汤大民在台下又提出要吴天石低头认罪，作为结束会议的条件，至此，姚劝阻无效，被一些人围攻哄下台。批斗会拖延到晚上十一点多，最后由徐荣生上台宣布结束大会。这时吴已全身抽搐，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于八月五日死亡。”

吴天石、李敬仪两同志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五日相继被残酷迫害致死，造成震动全省的“八三”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吕左兵等四人积极参与批斗活动，犯有严重错误，可由单位教育处理。黄家友是八三事件的发起人，他积极主张当晚批斗李敬仪同志，并带头去李家抓人，在游街和批斗会上对吴天石同志进行体罚活动，对吴、李两同志的死亡负有一定罪责，本应从严肃处理，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黄是在大多数学生积极支持下发起批斗活动的，事件中，黄又无力控制会场，致使事态升级、扩大，造成严重恶果。据单位反映，黄家友在工作中表现一直较好，有“老黄牛”之称。在调查传讯过程中，黄的态度较好，有认错表现。我们意见：可以免于刑事处分。

当否，请批示

南师八三案件调查组
八〇年四月十三日

◇ 资料四

南京师范学院档案室档案：在宣布逮捕华林森、汤大民决定大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15日

[编注：华林森是江苏省苏州市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文革后被定为“帮派分子”，“四人帮”在江苏、苏州的代理人。此人与南京“八三”事件无关。]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刚才宣布逮捕迫害革命干部致死人命犯汤大民的决定。这个决定，伸张了正义，打击了邪恶，平了广大群众的心头之愤。我们南京师范学院广大师生员工表示坚决拥护。

汤大民原是我院中文系的助教。在我院一九六六年的“八三事件”中，他是将原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同志残酷迫害致死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八月三日晚上，天气炎热，吴天石同志和他的夫人当时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付书记的李敬仪同志，突然被一伙人从家中带到南师，又拖又打，

浑身上下泼满了墨汁，带上高帽子，先是逼供，接着就把吴天石、李敬仪两同志又拖又推，架着冲出了学校大门，以很快的速度，沿着宁海路、北京西路、西康路游了一圈。途中，李敬仪同志被活活拖、打而死。遭遇之惨，人间少有，目不忍睹。吴天石同志一路上受尽折磨和迫害，游街回到学校后，吴天石同志已经站立不住，奄奄一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汤大民等人又煽动并主持召开了所谓“批斗会”，对吴天石同志摧残折磨。汤大民在会上给吴天石同志罗织了许多罪名。胡说什么吴天石写过一本书，这本书，是贩卖封建主义黑货、毒害广大青少年的大毒草，并且逼迫吴天石同志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吴天石同志坚持原则，说：“我是中国人，不是黑帮。”汤大民乘机进行煽动，因而引起一些人对吴天石同志又是揪头发，又是“坐飞机”，又是往他身上倒墨汁，还对他拳打脚踢。当吴天石同志生命垂危时，省委派来的一位同志上台讲话，劝导大家赶快结束。而汤大民仍不听劝阻，硬要吴天石同志承认是“黑帮”才肯收场。在汤大民的煽动下，又有一些人跳上台去，加剧了对吴天石同志的摧残，一直搞到吴天石同志昏迷不醒，全身抽搐。后来虽送工人医院抢救，依然无效，于八月五日二十一时死亡。以上事实说明，汤大民是一个迫害革命干部致死人命的主要罪犯。

此外，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汤大民还与周文昌、王化勤等人，结成“南京市革委会部分委员”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主动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和“四人帮”派来江苏进行特务活动的记者以及“四人帮”在《红旗》杂志社的亲信，勾结在一起，从他们那里领受“四人帮”的黑旨意，在南京进行反对省、市委的罪恶活动。他为了把省、市委的主要领导和一些基层的领导干部打成所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一些群众打成所谓“反革命”，曾先后五次向“四人帮”写黑信，寄黑材料。这些黑信、黑材料，都经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圈阅，有两件还转到了张春桥那里。汤大民还要求“四人帮”派工作组到江苏来，妄图上下结合搞垮省委。汤大民炮制了七份反动大字报，贴到南京街头和市委机关内，造谣惑众。唯恐天下不乱。汤大民还在施兆祥策划举办的一次共青团基层干部会上，煽动共青团要起来与党内千千万万的所谓“走资派”进行斗争。

汤大民被逮捕法办，是他罪有应得，我们完全拥护，并且要求专政机关依法给予应得的惩处。

~~~~~

## 【亡灵祭坛】

### “北大才子”沈元被处决及其他

• 王 锐 •

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曾谈及，1957在北大“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的589个学生中，“文革”中被先后处决的有5人，他们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语系的顾文选，历史系的沈元，哲学系的黄中奇，化学系的张锡琨（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这5位遇难的“北大才子”中，林昭遇难最早（1968年4月29日于上海），如今的知名度也最大。其次要数1970年3月至4月“一打三反”中在北京被处决的顾文选和沈元。目前已有海内外学者撰文著述研讨其人其事。至于黄中奇和张锡琨，各方情形，至今鲜见披露。

笔者此前探讨遇罗克遇难及“一打三反”相关情形，曾尽力搜集当年原始资料，小有所获。近期又陆续有新材料发掘出来。其中有两份原始文本，就涉及沈元被处决的一些内情甚至具体细节。现披露并作探讨，就教于海内外。



#### ◇ 沈元其人其事

沈元，浙江人，1938年出生，1957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同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农村劳动改造3年。1961年摘“右派”帽之后返北京，“因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而被历史学家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杰语）。“文革”中的1968年9月1日，沈元装成黑人，试图进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而被捕。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处决，年仅32岁。

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笔者以为，在沈元不太长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三个“闪光点”。

其一，沈元当年以全国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历史系。注意，这是当年全国高考的“文科状元”，不是如今媒体每年例行爆炒的这个省那个市“文科状元”之类，而且是没有“注水”的。其含金量大不相同。

其二，年不足20岁时，私下翻译和评议当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绝对是“第一人”，也是“唯一者”。

这点，笔者至今仍然叹服有加。在当今有互联网等资讯发达，社会及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背景下，沈元此举可能认为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年全球“冷战”背景以及中国大陆极为严酷的社会及舆论管制情形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政治敏锐度、胆识，和外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

其三，1966年“文革”爆发，年仅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历史界大师级人物。可见此时沈元史学造诣之深。看过沈元史学论文及研讨史籍的读书笔记的人，都对这位“年轻学者的史学功底惊叹不已”（余杰语）。何况，沈元还被送农村劳动改造，中断学业及研究达3年之久。

可以相信，倘沈元当年不惨遭处决，日后极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泰斗、大师级人物。

#### ◇ 沈元上了2月11日名单又侥幸被“刀下留人”

沈元1968年9月1日被捕，在狱中关了一年多，1970年4月18日才被处决。

为了给中共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为给公审公判作准备及造舆论，执行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先后于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发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讨论”的相关《通知》，供“革命群众讨论”并提出“处刑意见”。

所有那一年被处决者，都上过这种《通知》所附的名单。不过，沈元却是先后两次上了这种名单。第一次是1970年2月11日，第二次是一个多月之后的3月24日。笔者所见，沈元是唯一两次上过这类名单的人，不仅在北京市，全国范围也是。相类似的是，遇罗克最初

上了1月9日那份名单，因故被“刀下留人”，后来名字又被列入2月11日那份名单，却是被某个大权在握的“神秘人物”临时用黑笔加上去的，所以于3月5日与顾文选18人同时被处决（详见笔者拙作《遇罗克被处决内情的再探索及其他》，载《北京之春》2010年8月号）。但遇罗克的所谓“罪行简介”却只有一次印上《通知》。而只有沈元是两次上了这种《通知》。

这也得以为后世研究两份《通知》相关措辞的不同变化，留下了难得的原始文本。

先看2月11日《通知》关于沈元的文字，原文照录：

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通知》下发于2月11日，其时，当局已内定于3月5日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的顾文选等55人予以判决。3月5日北京市果然开了大会，顾文选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等共19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郎郎、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只有沈元1人是没杀也没判。

沈元这次侥幸被“刀下留人”，不杀不判，在人世多活了1个月另14天（3月份有31日），其具体原因，笔者仔细探讨后，认为可能有二。

一是3月5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所以将沈元留在了下批处决者中，这才出现了3月5日唯一对沈元既未杀也未判的情况。笔者在《遇罗克处决内情再探索》一文中提到那份经某位“神秘人物”用笔（红、黑色水笔及铅笔）删改批定过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2月11日《通知》，第2页正文部分（即案犯姓名及所谓“罪行简介”）左上角有用铅笔批注的“16人”字样，笔者曾分析这是“北京公法军管会”当局或北京市革委某个实权人物，预先确定的“处决人数”指标。后来，那位神秘人物在案件姓名前打“√”记号，并用黑笔在“简介”文字之后批上“死刑”或“死”字样，表明这是此批处决者时，从顾文选一直数下来，已经多达19人，加上新添上的遇罗克，已达20人。所以，那份2月11日《通知》名单上这位“神秘人物”的批注和作“√”记号，恰恰到沈元那里就嘎然而止。沈元在名单上列案件序号第19位，而列案件序号18位的“反革命杀人犯”韩仲才和齐桂兰（女），其姓名和序号前都有“√”记号，罪行文字简介后又批有“死”字样。

二是“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作出这个推论的依据，就是笔者在后来仍然被某些“神秘人物”批注过的3月24日那份《通知》所附名单上，在沈元名字及简介后发现黑笔批注的“死缓”字样。这说明当年有人确实对沈元提出过判“死缓”的意见和主张，可惜最后未被采纳。

#### ◇ 两份《通知》的文本解读和比较

但沈元的这次脱逃处决的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也是“北大才子”的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又“榜上有名”。他已是在劫难逃。

笔者有幸搜集到这两份《通知》原件。比较一下2月11日的《通知》和3月24日的《通知》文本，是很有意思的事。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当局是如何遵中共中央指示（更多是周恩来意图），努力为正全面铺开的全国“一打三反”运动做“样板”的。

2月11日《通知》正文如下（两段相关毛泽东语录省去）：

#### 通知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一个多月以后，“北京市公法军管会”3月24日《通知》（除去毛语录）全文如下：

#### 通知

为了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准备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遵照毛主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伟大教导，现将张华民等八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印发各单位，望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真组织广大群众讨论。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必须号召广大群众，掀起一个对反革命分子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同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请将讨论情况和对上述罪犯的处刑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注意保密，不要遗失。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仔细解读和认真比较两份《通知》文本，大致有以下区别：

其一，“打击”规模、声势和力度继续加大。2月11日《通知》公布并供讨论处刑的是“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3月24日《通知》公布并提交讨论处刑的是“张华民等85名罪犯的材料”，人数上多30人。

其二，试图将“一打三反”运动往纵深发展。

3月24日《通知》较2月11日《通知》文字长得多，增加了许多内容，如“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又如号召广大群众，“掀起一个对反革命分子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当然，也说了区分两种矛盾，实行宽严政策等。这个通知，表明了周恩来要将北京市作“样板”，将这场“一打三反”扩大化，纵深化（大

检举、大揭发、大清查），以至持久化（深挖隐藏敌人）的政治意图。

其三，让北京卫戍区介入“打反”。

3月24日《通知》上有一句话特别引人瞩目，这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准备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表明当局正式让北京卫戍区介入到“打反”运动中来。

北京卫戍区在“文革”中是很重要，也很特殊的一个单位，对于保证“文革”的发动和顺利运行“功不可没”。北京卫戍区除随时执行中央交办的一些特殊任务外，还以“监护”名义，拘押着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北京卫戍区当时不仅脱离北京军区建制，而且脱离总参和中央军委调动指挥，只有两个人可以直接指挥调动，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连“副统帅”林彪也无权指挥调动。让北京卫戍区介入“打反”行列，是意图增强“打反”的权威性和力度。1月9日和2月11日《通知》上没有北京卫戍区字样，前两次“公审大会”也没有北京卫戍区参与主持，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果然，4月18日处决沈元等人的那次“公审大会”，北京卫戍区就正式成为主持者之一。这显然是周恩来的安排。

◇ 3月24日《通知》对沈元“罪行”措辞的微妙变化

沈元在上次“刀下留人”之后19天，又被当局上了3月24日的下发的相似《通知》。笔者仔细比较，这次《通知》上沈元的所谓“罪行”措辞行文方面，有了一些微妙变化。研读起来，很有意思。

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简介”，由两个自然段组成。第一个自然段，改动不大，仅将最后一句“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罪”删去。原因不明，且意义不大。

关键改动在第二段。首先，将前份《通知》中，“并积极策划叛国投敌”，改为后一份《通知》中的“积极策划叛国投敌”。这一改，同样事实，所谓罪行自是严重得多，“企图”还是只有意图，并未实现，“积极策划”，则是又主动、又积极，大不一样。措词者果然“妙笔生花”。以前常说“以笔杆子杀人”，这可算一例。

其次，“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大使馆”一句，在后一份《通知》中，改成了“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闯入了”改为“投靠”，性质明显不一样。“闯入”，其动机尚不明确，可作多种解释，“投靠”，则是有明确目的，属定性词语。

最后一句的“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为“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对“文革”的所谓“污蔑攻击”一词，一律改为“恶毒攻击”。所谓“恶攻”罪，是“文革”中最严重的大罪重罪。

另外，在案件序列号上，前一份《通知》上，沈元排第19位。3月24日《通知》上，

沈元排名第17位，提了两位。按惯例，排名越靠前，当局认为其“罪行”越严重。

3月24日《通知》上这番改动，已经表明沈元这次是在劫难逃。

◇ 《通知》文本上的批注显示对处决沈元曾有争议

笔者得到这份“北京市公法军管会”1970年3月24日《通知》，也不是一份普通印刷文本，而是有特殊价值的原始文本。如同笔者在前文提到过《遇罗克处决内情再探索》详细解读过的那份2月11日《通知》文本一样，是被某个或某些内部高层人物批注过的特殊文本，颇有研究价值。

经笔者初步分析解读，这份被批注的文本有以下特征：

其一，封面首页右上角，用铅笔写有“讨论”二字，似乎表明这份文本是北京市革委会或“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内部讨论定刑并记下留存讨论结果（定刑意见）的原始文本。

其二，内文（即案犯姓名及所谓“罪行简介”）部份，有个别文字之下有用铅笔划的横线及批注字样。如第2页第1个案例“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华民”，在简介文字之后，有铅笔批的“死”字样。同案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白满囤”，其中“骨干”两字之下有铅笔划的横线，简介文字之后，亦有铅笔批的“死”字样。同案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齐国振”，其“骨干”二字下，亦铅笔划有横线，正文之后，有铅笔批注的“无期”二字。同案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石宝丰”，简介文字之后，有铅笔批的“十五年，剥五年”字样。分析这些文字，大概是表明，对石宝丰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再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案例1与案例2之间的文字空白处，另有黑笔批的一行小字：“张、白、齐死，石死缓。”这似乎表明最终结果是，张、白、齐3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4人中仅原定判刑15年的石宝丰被判“死缓”。最终是4人中的2人还是3人被处决，要看当年判决书方可确定。

另有意思的是，案例4“现行反革命犯雷翀云”，大概因“翀”字属于冷僻字，特用铅笔在其上注了个“冲”字样，意在提示“翀”字读音为“冲”。

这个时年42岁的雷翀云，其实算是“文革”时期的“上访者”。从材料上看，其时在陕西某地，1969年12月与其妹雷淑君来京上访不遂，在长安街张贴散发传单数百份。没料被捕后恰逢“打反”运动，丢了性命。其妹26岁的雷淑君，从黑笔文字批注看，先是判“死缓”，后改为“无期”。令人扼腕。

总的说来，整个76个案例85名“案犯”中，用铅笔作的记号和文字批注都不多，绝大多数批注用的是黑笔。由此，似乎也可以推断，在文本上作审定批注和记号的，不只是一人，可能是两人甚至多人（字迹也不尽相同）。

其三，这份《通知》上公布的85人，每个人简介后面均批注有判刑结果，如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或1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这85人，未有低于12年刑期的判决，哪怕普通的盗窃犯）。这与笔者提到的2月11日那份被批注过的《通知》不同。2月11日那份《通知》的批注，只涉及立即处决的死刑，连“死缓”案犯亦未予以相关批注。

其四，这85人中，被批注“死”字样，表明将遭立即处决的，笔者依次统计，大约在2

4至28人之间（因其中有些批注是多种，如有人意见是“死刑”，有人意见是“死缓”，甚至“无期”）。其中除确为杀人强奸等刑事犯罪外，属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政治犯，大约有18人。其中宋振明、王作臣属于1949年之前的“历史反革命罪”。与沈元同为“现行反革命叛国罪”的有3人，其他二人分别是水电部海河勘测设计院助理技术员董逢春（35岁），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管理员苍树德（37岁），是已成功出走后被引渡回国，惨遭处决者。

其五，在这份《通知》中，批注的内容显示出来存在某些意见分歧，或说对处刑的结果意见不一致。笔者仔细辨认，其中有多达7人的不同意见批注（每个人均以姓氏代表，如“张”、“周”等），分别有（按出现先后）：张、周、崔、刘、庞、石、杜等，除“刘”一人，笔者推断是当年大权在握的“北京市公检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外，其余数人，不知指的是谁，待考。

正由于有多人参与其中，所以，同一个“案犯”批注处刑意见，各不相同。如案例第13的43岁的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职员马福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刑时，其文字之后，最先批注的是“死”字，之后，又写有：“张死缓，无期。石、崔死缓”字样。分析这个批注表明，对马福昌，最先有人认为应判“死刑立即执行”，但张姓人士的意见是判“死缓”甚至“无期徒刑”。另外，石和崔姓人士，两人意见都是判“死缓”。因此，最后这位北钢图书馆的马福昌（从文字简介看，也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文革思想者”，写过40余封匿名信评说文革及一些文革当权者而致祸）。其最终命运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得看当年“判决书”，或是当事人回忆。笔者亦望知情者提供相关情况。

这里就说到本文主人公沈元。这份文本上沈元简介文字之后，批注有“死。张死缓”字样，表明也是这位张姓人士，认为对沈元可以“刀下留人”，处以“死缓”判决。可惜的是，这个意见最终未被采纳，沈元终于4月18日惨遭处决。

#### ◇ 沈元遇难于专制和极权

21世纪以来，沈元其人其事渐受海内外学者、知识界人士瞩目。刘再复先生、余杰先生，都专有文章缅怀沈元，并有相关评说。沈元当年旧友、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宋诣瑞女士，更是于2006年编了一册题为《难以纪念的纪念》的文集，纪念追忆沈元。

刘再复在题为《面对高洁的亡灵》的文章中写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他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余杰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沿着刘再复先生的思路和追问，评说道：

在人人都宣称自己是“无辜者”的“后文革时代”，刘再复以罕见的真诚打破了“无物之阵”般的、厚厚的沉默，他从当年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反省、开始追问：“谁让沈元走投无路？谁让沈元安生不得、逃生无处？谁把沈元推向绝望的悬崖？”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制造者之外，我们盲目的呐喊、盲目的讴歌、盲目的义愤、盲目的声讨、盲目的批判，难道没有责任吗？说“受蒙蔽无罪”，在法律上也许部分可以成立（不是全部都能够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说得过去呢？受“蒙蔽”下，我们内在的恶是何等丑陋啊！那些文革的幸存者，那些以知识、文化和思想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也是凶手、承认自己内在的恶是如此丑陋呢？（余

杰《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刘再复先生和余杰先生，从反思“文革”，进而探讨和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和“集体无意识”，以及追问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其出发点应该是不错的，其中也不少真知灼见。不过，他们两人的这些观点，尤其是对沈元死因的探索拷问，笔者并不赞同。

道理很简单，因为沈元不是如卞仲耘等人那样，死于“文革”之初那种因“文革”思潮和“暴力文化”煽动起来的群众暴力或“红卫兵暴力”，而是死于崇尚专制和极权的国家政权之手。换句话说，沈元（包括林昭、遇罗克、顾文选、王佩英、马正秀，到以后的张志新、王申酉等思想者先驱者），是被国家政权，以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性理由，通过所谓法律程序，以国家之手、法律之手剥夺其生命的。这是当权者借助国家机器，试图将那些有“异端思想”或“异端行为”的人，从肉体上整体消灭。两者性质应当是迥然不同。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的法律是以高压而不是以智慧来统治中国人，由此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大地上的自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进一步认为，缺乏自由度和自由精神，是造成至今被国人引以自傲的“中国文明”，停滞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初期阶段的原因之一。这些先哲的见解，值得国人深思。

到了现当代，国际社会要求废除死刑的呼声渐高。罗伯特·巴丹戴尔，是当今法国著名律师，后来做了法国参议员和司法部长。他是推动法国废除死刑法令最有力也最有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目前致力于全世界推动废除死刑。2006年下半年，我国知名学者叶知秋在巴黎拜访过他，并就废除死刑展开访谈对话。其间，巴丹戴尔先生对死刑与专制主义和专制政权的关系作了很精彩的阐释。

巴丹戴尔首先引用一句雨果的名言：“死刑是残酷和专制的一种永久性的标志。”然后，他一针见血评说：“毫无疑问，死刑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永远的记号，因为死刑肯定了国家对于公民的绝对权力，反复地肯定。法律通过各种具体的标准和细节，为国家争取这种判处死刑的权力。”他还解释说：“是否杀人，这是国家和罪犯的区别。最绝对的权利，就是国家要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

最后，巴丹戴尔先生尖锐地指出：“死刑把人类的偏见最大化地带入审判之中。通过死刑，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因素都被放大了。”（以上见2006年第31期《南方人物周刊》叶知秋：《你见过死亡的颜色吗？》）

这里借用巴丹戴尔先生的思路和逻辑，笔者认为，“文革”中当局对沈元的处决（还包括林昭、遇罗克、王佩英、马正秀、顾文选，以后的张志新等成千上万遇难者的处决），是当权者将那种“人类偏见”最大最大化地带到当年所谓的“审判”中，而且将中国社会本身存在的“不公正因素”，不仅仅被放大，而且推到了极致。

◇ 沈元至今在北大被冷落

笔者认为，沈元和林昭等人一样，不仅是“北大才子”，而且是在他们身上真正传承着“北大精神”，寄托着“北大人”的“光荣和梦想”的先驱者，是敢于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斗士和勇者。

可惜，在当下的北大，沈元至今仍遭到冷落。余杰先生在文章中感叹：

沈元，对于今天的北大学子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只记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行走过一名同样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余杰：《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这是相当令人不解，也相当令人失望的。在物欲横流，全社会浮躁，理想道德和人文精神普遍丧失的当今中国，要年轻学生们去关注和关心与他们的分配、就业，乃至房子、车子全然无关的学长，似乎有些勉为其难。

不过，北大当局是不应该不记得，北大曾经有过林昭、沈元这样的学子的。前些年北大隆重庆贺“百年校庆”，还编有《北京大学记事》、“北大百年编年史”之类。笔者没见过相关资料，不知在这些资料中，是否给予了真正传承着“北大精神”的林昭和沈元这些思想者、先驱者，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或是干脆也是只言不提？

对北大当局也好，北大学子也好，关注 GDP 和财富的增长，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以至衣袋里的银子，也没什么不对。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知名高等学府，总还得有人来“仰望星空”，得有人来关注那些物质财富之外，科学、艺术的创造，以及自由、民主和人文关怀，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笔者以为，林昭和沈元，就是属于“仰望星空”的人。

正由于此，笔者以为，有理由在未名湖边，给林昭和沈元这些人立塑像（正像有人已给遇罗克、张志新立塑像一样）。而且，笔者相信，在北大校园里，在未名湖畔，一定会有林昭、沈元等的塑像竖立起来。即便是我这一辈人看不到，我子孙那一代，或许将能看到。

（说明：2月21日《通知》上沈元名字左边空白处的几行字迹，系笔者之前的那位收藏者用蓝色圆珠笔批注，不是该文本上的原始字迹。特说明。）

2010年9月30日于自贡危楼书屋

□ 来源：共识网 2012.1.15

~~~~~

【人物追踪】

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

• 刘庆棠 • 陈徒手 •

〔采访小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

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他曾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可惜天不假以时日，来不及对自己一生的成绩和教训做一个真切的总结。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陈徒手）

◇ 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外面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话，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秋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

“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棠，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一五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

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 心情郁闷的迟群

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以前我们认识，但此时不能说话，只能彼此点点头。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到年头，回家了，到上海图书馆当历史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

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多，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

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敢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舞，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h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而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

□ 原载《信睿》2012年第12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